

《申報·自由談話會》

——民初政治與文學批評功能

● 陳建華

或許顯得不無突兀的是我——對於學術的熱情首先在於發現和編輯「遺失」的被忽視的文本——應當發覺自己為這些問題所左右。

蓋茨①

說起《申報·自由談》，就不得不提到現代文學史上為「典律」(canon)所排斥的「他者」及探索「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問題②。《申報》創辦於1872年4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數月——停業。「自由談」是該報文學副刊，創始於1911年8月，也和《申報》、民國相始終。但從50年代之後，現代文學史上偶而提到《申報·自由談》，多半因為30年代初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了大量雜文，被認為是猶如擲向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匕首，最能代表後期魯迅的戰鬥精神。1931年，他在著名的〈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講演中，對上海灘上的「才子加流氓」即創造社及「鴛鴦蝴蝶派」等，嬉笑怒罵地極挖苦之能事，且追蹤他們的根子出在「從前」的《申報》③，意味着他對該報的副刊一向沒有好感。然而時隔不久，他開始成為「自由談」的撰稿人，因為在1932年

底，「自由談」的主編換成黎烈文之後，改弦更張，向「新文學」開放，於是「在魯迅等作家支持下，成為30年代雜文的一個主要陣地」④。

文學史一般不提1932年之前的「自由談」，即使提到也含貶意。這也跟「典律」的排斥所謂「鴛鴦蝴蝶派」有關，因為「自由談」的創辦者王鈍根，以及另外幾位主編陳蝶仙、周瘦鵑等屬於「禮拜六派」，一般視作「鴛鴦蝴蝶派」作家。近年來「鴛鴦蝴蝶派」(此處暫不論使用這一概念在學術研究中的局限性)在市場上走紅了一陣，文學史也重新作了評估⑤。儘管見摒於主流意識形態，這一派的文學和現代的「都市意識」(urban mentality)有很大關係，如果單從「純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都市文學，似難以深入。如果不將其文學內容放到都市日常生活與民國的意識形態的境遇中加以觀察，就像魚脫離了水；反過來說，研究民國時期

「自由談」是《申報》文學副刊，創始於1911年，文學史一般不提1932年之前的「自由談」，這跟「典律」的排斥所謂「鴛鴦蝴蝶派」有關。「鴛鴦蝴蝶派」的文學和現代的「都市意識」有很大關係。研究民國時期的都市文學、印刷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如果忽視了「鴛鴦蝴蝶派」文學，亦會失去一大塊風水寶地。

「自由談話會」專欄，從1912年10月23日到1914年9月29日為止，由王鈍根直接主持，園地開放，以「扶掖國家，誘導社會為宗旨」。在四百餘期「自由談」中，每次刊登數則至十數則不等，片言隻語，或專題論述，無不涉及時事，二百餘位作者包括市井中各色人等，有的僅十五歲，也有數位年輕女子。

的都市文學、印刷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如果忽視了那些「鴛鴦蝴蝶派」文學，亦會失去一大塊風水寶地。

所謂舊派的《申報·自由談》，確實以消閒為主導，然而同今天那些包裝亮麗取媚白領的消費文學不可同日而語。從1911年到20年代末，儘管連年混戰，政府腐敗，共和政體徒具空名，然而憲政的軀殼尚存，其精神尚未完全泯滅，國事尚未淪於非紅即白、你死我活的「革命」漩渦中。《申報》作為私營企業，仍在印刷資本主義的機制中運作，表現了相對的獨立形態。其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即使有限，對於後繼者而言，也成為可望而難及之物，在中國現代史上亦彌足珍視。如王鈍根、周瘦鵑等，固然遵循報社的商業路線，但身為「報人」，也有一定政治立場和道德守則，在使報紙副刊發揮現代都市消閒功能的同時，時時切入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課題，同民國初期的政壇風雲、歐美摩登新潮或市井風尚息息相關。尤其是他們大多接續了晚清改革派的思想底線，對於實現民主立憲方面仍懷着夢想，所以在連續不斷的危機中，在權奸竊國、禍亂相尋、軍閥相爭、革命橫流之際，「自由談」中的言論，或直言誅伐，或冷嘲熱諷，或明或晦地傳達了某種「民意」。而王、周等人的言行及編輯方針，既同《申報》的政治傾向及其公眾輿論的操縱密切聯繫，卻也透射出他們自己的價值認同與性情趣味^⑥。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在中國境遇中，「自由談」基於一個獨立商報的立場，嘗試了某種公民能夠自由言說、自由運用理性的「公共空間」，而與此同時，其中所反映的都市日常欲望與現代性之間的弔詭和抗拒，在今天的全球化風景裏，亦不乏

歷史考鏡的價值。李歐梵先生曾在那篇很有影響的〈批評空間〉的開創一文中，對「自由談」初期的「遊戲文章」的風格及其自由言說之間的關係作過精彩的分析^⑦。本文順着這一思路，集中探討民國初年「自由談」中「自由談話會」這一專欄，就其文學批評和政治的關係作粗略的勾畫，向大家討教。

一 「自由談話會」的「中立」立場

1911年8月24日「自由談」創刊，時機的選擇似順着「革命」的勢頭，數月之後對於民國的誕生表達了歡欣之情，也為自己的生命塗上了喜色。它一開始便與政治發生密切關係，而精神上接續的是晚清以來的改良立憲的傳統。遠的不說，值得一提的是在1909年初，副刊頗不尋常地突然介入時事——地方選舉。其時清廷實行「新政」，在多般磨蹭之後，終於宣布實行預備立憲。1月清廷頒布地方自治章程，3月上海縣進行初選。副刊連續刊出有關選舉的作品，如小說〈初選舉之醜歷史〉、〈選舉鑑〉等，揭露和諷刺大小鄉紳在選舉過程中不法操縱、營私舞弊的種種劣迹。其他如「清談」、「記事」、「遊戲文」、「諧著」等欄目中所發表的，也都和選舉有關，發揮了不同文類的效能。整個事件的意義，如一篇文章點到的：「此次初選舉，係數千年來第一次創舉。」這些作品所共同關注的，不光是宣泄了選民的憤慨和不滿，更強調了選舉中程序和規則的重要。如〈選舉運動法〉一文在揭露選舉事務所某人利用他的兒子、學生為他製造輿論時說：「宣講員者，宣講選舉之權利及一切

投票方法而已。至何人當選何人不當選，應聽一般公民自擇。」^⑧某種意義上這像是一次憲政的普及教育；而對選舉作出這樣及時的反應，似乎反映了副刊編者對「憲政」的熱情，但作為報紙的文學專頁，起到與民意直接溝通、交流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如「清談」欄〈所希望於新議員〉一文中的「記者」，在向新任議員提出一連串希望時，蘊含了這一身份的特殊意義。

這樣延續了約兩個月，到5月底，編者登了一則告讀者，說明當初中止了連載翻譯小說《潘傑小史》，是因為初選開展之後，發生了各種情況，報刊不得已捲入事態，所刊出的文章，正如〈「選舉瑣談」、〈運動新法〉種種問題，箴惡勵善，指事舉劾，亦當務之急」^⑨。如今既已「事竣」，譯文也繼續刊登，意味着這一臨時插入的特別節目告一段落。

在「新政」時期，《申報》「報屁股」版面上的文學空間漸漸擴展，類目也趨於多樣活潑，儘管如此，仍和非文學的欄目同佔一個版面，因此「自由談」的命名則意味着文學名正言順的有了自己的一塊地盤。另一層聯繫是，1907年席子佩接辦《申報》之後，為報紙作了一些改革，這回他起用其青浦同鄉王鈍根。鈍根原名晦，是桐城派古文家王鴻烈的孫子，曾在家鄉辦過《自治旬刊》，鼓吹推翻滿清，傾向民主共和^⑩。「自由談」開張，頭條欄目「遊戲文章」因襲了「遊戲文」和「諧著」，除了常設的小說、戲曲、詩詞之外，另闢了一些新欄目，如「心直口快」、「海外奇談」、「千金一笑」等，含有明顯的娛樂取向。

「自由談話會」這一專欄，從1912年10月23日開始設置，到1914年9月29日為止，維持了二年左右^⑪。由王鈍根

直接主持，園地開放，以「扶掖國家，誘導社會為宗旨」^⑫。該專欄出現在四百餘期「自由談」中，每次刊登數則至十數則不等，或片言隻語，或專題論述，無不涉及時事，共有二百餘位作者為之投稿，作者包括市井中各色人等，有的僅十五歲，也有數位年輕女子。這樣參與的廣泛性，或許編者的意圖乃在「自由談」中開一扇「言論自由」的窗口，通過某種「來者不拒」的方式給讀者提供溝通機會，對於眼下即刻發生的事情，上至政局公卿，下至時尚弊端，發表一己的感想或批評，意在反映「民意」。

作為上海的第一大報，《申報》對於市民的輿論導向起重要作用且具有代表性。在國事歷經危亡之際，該報沉浮於政治風浪中，不免游移在新舊之間，體現出複雜的政治取向。由於經營上以廣告與銷路為主，它在政治上能保持相對的獨立自主性。如趙建國提出的，辛亥革命之後，《申報》「對革命的態度由非議到同情到同盟再到中立和背棄」^⑬。的確，「自由談」的政治取向和《申報》大體上是一致的。民國伊始，它對於革命的熱情擁戴，從發表〈十不可和〉和〈北伐十宜〉兩文可以看出^⑭。主張北伐和反對南北和議，表明了對清廷或袁世凱毫不妥協的態度。所謂「遊戲文章」大多借舊文體的軀殼，而在子序所作的〈新四書〉寫道：「袁慰公譎而不正，孫中公正而不譎，褒孫抑袁，旗幟分明」^⑮。袁氏的鄙陋形像，在瑣尾的〈擬梅特涅致袁世凱書〉中，所謂「倘足下亦不明大勢，欲奮螳臂以擋車，則將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千刀剗王莽，萬冢磔蚩尤，恐受禍之慘，更將百倍於老夫也。」^⑯借臭名昭著的梅特涅之口，着實把袁氏奚落了一番。

作為上海的第一大報，《申報》對於市民的輿論導向起重要作用且具有代表性。在國事歷經危亡之際，該報沉浮於政治風浪中，不免游移在新舊之間，體現出複雜的政治取向。辛亥革命之後，該報「對革命的態度由非議到同情到同盟再到中立和背棄」，而「自由談」的政治取向和《申報》大體上是一致的。

「自由談」作者大多對民國抱着極度的希望，結果是強烈的失望。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自由談話會」指責孫中山等人輕啟戰端，對革命派一片咒罵聲。仲琴說：「嗚呼，今之所謂偉人，古之所謂民賊也。」考察「自由談話會」對革命態度的轉變過程，可發現無論是支持革命或偏向北京，它既不姓孫也不姓袁，貫穿始終的是一種批評功能。

然而當袁世凱反戈一擊葬送了清朝，成為民國元首和國民希望的載體，而孫中山在外蒙獨立、大借外款等一系列決策上顯示其荏弱，民眾在失望之餘，更希望出現首先能捍衛民族利益和尊嚴的強人政權。袁氏在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後，形勢對他看好。至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陳其美在上海宣言反袁並率軍攻打江南製造局失敗之後，「自由談話會」對革命派的態度急轉直下，怒詈憤斥形見於色。戰禍殃及平民，破壞市場，連日來「自由談」中各種詩文篇什描繪了市民流離失所，屍骸枕藉，穢氣薰天的慘狀，而「自由談話會」更直接咒罵那些革命「偉人」——當然指的是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指責他們輕啟戰端，事敗後他們自己則逃往國外，一走了之。仲琴說⑩：

今之所謂偉人，吾知之矣。得志則睥睨一切，氣焰逼人；一經失志，則主張破壞，無所不為。嗚呼，今之所謂偉人，古之所謂民賊也。

對革命派一片咒罵聲，其他所謂「偉人之所最喜者，金錢與美人。偉人之所最懼者，手槍與炸彈」等⑪，不一而足，極個別的甚至稱之為「叛黨」，要求「執政諸君，籌定方略，陳師鞠旅，速滅此輩以謝天下」⑫。那就完全在幫政府說話了。

表面上「自由談話會」跟着權勢走，屈從袁氏的淫威，但事實上並沒有背棄革命的理念。「自由談」儘管處於報末副刊，糾夾着正經和餘興，既是情緒的晴雨表，又像價值的天平，其影響固然不及正版要聞，但在意蘊與功能方面卻更為複雜。如果對「自由談話會」的「革命」態度轉變過程再作些

考察，可發現無論是支持革命或偏向北京，它既不姓孫也不姓袁，其中始終貫穿、活躍着一種批評的功能。

即使「自由談」在擁護革命，支持北伐的基調中，已經出現不協之音。對民國抱着極度的希望，結果是強烈的失望。1912年雙十節的「自由談」意味深長，慶祝聲中卻暴露了民國的迅速腐敗。在朱士龍〈祭武漢死義諸志士文〉中，更悲歎的是目下擷取革命果實者彈冠相慶、貪天之功、同室操戈的種種令人痛心的癩狀。王鈍根的漫畫〈紀念會中之紀念品〉猶如一幅黑色幽默，其中「英雄枯骨」與「民脂民膏」相映襯，也是對現實的譏刺。這一期的小說題為〈兩面觀〉，作者癡萍，通過兩人對話，說明應當對民國採取既樂觀又悲觀的態度，表明即使在慶祝的時候也不忘清醒的觀察和評估。

對黨政要人包括孫中山的指名道姓的批評，已不時出現。受「自由談」明槍暗箭最多的是滬軍都督陳其美，他慣於尋花問柳，花天酒地，被譏為「花都督」或「風流都督」。1912年10月底，「自由談話會」專欄剛啟動，刊登了一則「談話」，關於孫中山巡視各地，所在官員接待時鋪張浪費，「奢華糜麗，殆視前清之為親貴辦差者而過之。」⑬作者王鈍根，後來又寫了「滑稽小說」〈外國便桶〉，講孫氏的某次巡視，某官員發現他房裏沒有便桶，就從上海洋行購來「極精緻之外國便桶一具」。小說不光諷刺當官的溜鬚拍馬，也是諷刺孫氏的洋派作風和外交上的軟弱，所謂「先生二十餘年出亡在外，坐外國便桶已成習慣」⑭。這裏可看到「自由談話會」和其他遊戲文章之間的互動，使文學表現與評論相得益彰，王鈍根為之樹立了一個範本。

當二次革命失敗，袁氏取消國會，取締新聞自由，嚴厲鏟除異己，一步步走向獨裁時，「自由談」通過諷諭、質詢等直接或曲折方式表明其不偏不倚「中立」的言論更值得注意。在痛斥革命「偉人」之時，「自由談話會」另一方面鼓吹調和，表明同政府保持距離。劍齋說：「吾願南省諸君子，顧全民生，不作鷸蚌之持；吾願袁黎諸公，保其盛德，莫效急兔之迫。」^②同時指出袁氏鎮壓國民黨漠視法理，如良知說：「未經法庭審查，遽以治罪，固未能使其心服，亦安能取信於人民乎？」^③

9月間，批評言論集矢於張勳身上。袁世凱派他南下和革命軍交戰，他攻入南京，縱兵燒殺搶掠，所謂：「寧城人民殘遭大難，奸淫劫掠，實為歷古以來所罕有」，並揭露他「寧城克復旬餘，城中並不懸五色國旗，而張勳欲掛龍旗」^④。連日來「自由談話會」追擊不捨，其火力決不亞於前一陣大罵革命黨江南製造局之役，而且批評矛頭必然指向袁政府，豁齋在指責「項城棄寧民」時，呼籲「除暴安良，急於星火，人心將去，無託空文也」^⑤。隱晦的諷諭見諸王鈍根的遊戲文章〈東鄰悍婦傳〉，影射袁氏俯從日本，彷彿預言日後他的賣國行徑^⑥。另在〈皇帝之魔鬼〉一文裏，說袁氏不會受專制魔鬼的誘惑，企圖恢復帝制。所謂「袁氏非至愚，必不為皇帝」的話，是給他戴高帽子，但也亮起他要當皇帝的危險信號^⑦。「自由談話會」的質疑意在伸張民國法制與自由的真諦，如無邪子重伸共和的基本價值^⑧：

共和者，反乎專制之謂。在在遵從民意，以一國之民為主體者也。

陳民血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者人群進化之根本。」^⑨同樣，「自由談話會」中不斷出現討論議會、憲政的言論，熱望民國實踐民主憲政走上正途，尤其在4月正式國會召集至11月被袁世凱強令解散期間，這些言論針對其專制獨裁的傾向，而施之以壓力^⑩。一位叫問海的寫了十數句話，皆以「豈不快哉」作結語，表達了有關時局的普遍願望。第一句就說：「正式政府成立在即，聚全國政法名家於一堂，精研民國憲法草案，以俟兩院之參考，豈不快哉！」^⑪林星甫說^⑫：

國會者，國脈也，民命也。阻我國會之進行，即為我全體國民之讎寇，國家之公敵。

「自由談話會」有關英美等不同國體和政黨、議會制度以及中國應該依照英國模式的言論，大不了重複了一些晚清以來關於憲政制度的常談，此刻在嚴峻的現實中呼籲：「共和的教育者，在使國民理解代議制度為何物」，顯見其緊迫性^⑬。

總之，雖然「自由談」的政治傾向前後有所變化，經歷了對「革命」的愛戴和失望，但這轉變並沒有根本改變民主和共和的信念。正如孽兒所說^⑭：

《申報》者，為中立之和平派，浮躁少年觀之，惡其不主張破壞，媚上派觀之，惡其不袒護政府，然而《申報》自若也。對於循規蹈矩之國民，感情為最深。

這裏強調「中立」體現一般「國民」的「感情」，正是「自由談話會」的特色。

當二次革命失敗，袁氏取消國會，取締新聞自由，嚴厲鏟除異己，一步步走向獨裁時，「自由談」中陳民血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者人群進化之根本。」而王鈍根的遊戲文章〈東鄰悍婦傳〉，則影射袁氏俯從日本，彷彿預言日後他的賣國行徑。

二 「自由談話會」的「討論」性質

「自由談話會」緣自某種「討論」的需要，具有同人性質。1912年8月出現一篇滑稽小說〈神權談話會〉，很可能是陳蝶仙所作。講的是某廟中眾神悲歎世道突變，善男信女愈來愈少，於是開個「談話會」「討論討論」。結果是眾神決定走出廟門，投入社會，大多以教師為業，各展所長，如孔夫子去教國文經學，如來佛教西洋文學等^⑧。這頗似一個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自覺轉型的寓言，而事實上他們的講壇是報紙，與會者無非是「自由談」的作者。自副刊見世一年有餘，已形成一群作者，似乎萌發了一種凝聚起來發揮更大效能的要求。這樣的團體意向反映在不久刊登的標題即〈自由談〉的短篇小說裏。小說劈頭問道：「自由談何為而作乎？」作者自答：「自由談之命意，無小說價值；自由談之文字，無小說價值；自由談之談話，無小說價值。」作者嘉定二我是「自由談」投稿者之一，強烈否定「自由談」的「小說價值」，目的是否定其消遣價值，而強調它的嚴肅性。其實在此前就有言及「自由談」性質的文字，早在3月間，滌骨的〈自由談中之自由談〉一文云^⑨：

自由談者，閱報之談話室也。自由談者，惡人之照妖鏡也。自由談者，文字之俱樂部也。自由談者，國人之議事廳也。自由談者，地方之宣講所也。自由談者，言論之監督官也。

現在嘉定二我將這種提升「自由談」的要求表達得更為迫切，他聲明「自由談」的作者首先是「自由思想者」。小說最後說^⑩：

自由！自由！天下幾多之罪惡假汝以行，天下幾多之人民賴汝以生。

談話！談話！記者之談話會，閱者之談話室。自由談，談者自由，不自由者毋談！毋閱！

10月23日開始設立「自由談話會」，代替了原先的〈心直口快〉專欄，但性質大不一樣。「自由談話會」從一個遊戲文類獨立出來，標舉其非遊戲性，作為批評空間得到了擴展。如果說「自由談」本來以趣味為主，如今同人們覺得有了一個直接干預現實的空間。如覺迷所指出：「『自由談話會』欄，各表所見，為時局痛下針砭。」^⑪但稿木子的「愛之切」的表述中，「自由談話會」似乎別有懷抱和性格^⑫：

夫諧文小說，資人玩賞者也。縱有班香宋艷，亦不過使讀者擊碎唾壺，雖其間嬉笑怒罵，於人心世道，未嘗無裨，然究屬側擊傍敲，不能當頭棒喝。惟「自由談話會」則不然，可以莊，可以諧，可以諷，可以勸。可以董狐直筆，可以東方滑稽。口所欲言者筆運之，言不能行者文達之。不以寒蟬貽譏，不以飛蝗畏禍。既可為時局之鑑，尤足伸言論之權。有以哉，予看《申報》，必先看「自由談」；看「自由談」，必先看「談話會」。愛之切而不覺其心之偏。

這等於同人之間的自我切磋和鼓勵的空間，也有意凸顯「自由談」的「自由」精神。它的出現並非改變副刊的文學性，相反各類遊戲文章與「自由談話會」相得益彰，更能發揮其批評效能。如針對革命黨的製造局事件和張勳的南京淫掠，各類文學創作連日出現，而「自由談話會」中對張勳或民黨

1912年3月，滌骨一文云：「自由談者，閱報之談話室也。自由談者，惡人之照妖鏡也。自由談者，文字之俱樂部也。自由談者，國人之議事廳也。自由談者，地方之宣講所也。自由談者，言論之監督官也。」後來嘉定二我聲明「自由談」的作者首先是「自由思想者」。

的厲聲譴責，不啻畫龍點睛。像瘦蝶的〈羅織大學章程〉或鈍根的打油詩〈勸人莫打落水狗〉^⑩，對照「自由談話會」中關於袁氏鎮壓民黨蔑視法律的責詢，其意義就更為明顯。

關於「自由談」的命名，李歐梵先生認為，源自於梁啟超的《飲冰室自由書》。我覺得「自由談話會」的「討論」形式也和《清議報》的英文原譯*The China Discussion*有關。它成為「自由談」的靈魂，是作者同仁互相坦露心靈的窗口、交流意見的場所。的確，其中活躍着一種「記者」的集體意識，賦予整個版面以某種精神氣象。「自由談」沒有固定的「討論」計劃，在形式上完全是自由的。有趣的是同人們零碎發表了許多有關「自由談」和「自由談話會」的文章，包括各種形式，如了青〈自由禪〉、紫塵〈談自由先生傳〉等，各聘想像，試圖形容或界定它們的特徵或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探索「自由」的真義及自我身份的體現，也常夾雜着某種自嘲的反思。

「自由談」的文風，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他們競相使用種種比喻來形容「自由談」，單單如井蛙所列舉的，自由談如良師畏友、如炸彈手槍、如嬌妻愛子、名山大川、照妖寶鑑、海市蜃樓、情絲萬縷、着地水銀、如來說法等，琳琅滿目也像一個萬花筒。有意思的是，有的把「自由談」譬作「古董店」，王鈍根是「古董店經理」^⑪。的確，「自由談」古色古香，使用的是文言，遊戲文章的拿手好戲是「戲擬」古文體——從孔孟語錄、古文名篇到《西廂》、《紅樓》等等——無非經典之作。它是舊文體的博物館，也是新文體的實驗場。雅俗雜陳，不光傳統的各類體裁應有盡有，還包括時下的通

俗文體如攤簧、五更調等。更有趣的是許多新創的戲擬文體，如電報、章程、廣告、戲單、彩券等，確實是光怪陸離，無奇不有。

那末，既然「自由談話會」別創一格，作者們也特別關注它獨特的文風。一般來說，談話會只是個人直陳己見，主要是議論，和「自由談」相比，在文體表現方面似乎局限得多。如前面稿木子所說的，它可以且莊且諧，當然其作者都是遊戲文章專家，也難免「滑稽」成性。我們也應當看到，他們所表述的「中立」態度，模稜兩可，折中調和。這既是一種表述策略，卻不無自我弔詭的成分。在「光怪陸離」之中也包括「『自由談』像倒翻字紙籠種種色色」那種並不光輝的自我表述。但是我想強調的是「自由談話會」一種獨特的修辭方式，在第一人稱的表述中滲入強烈的意志，具體體現為呼籲、勸誘等口吻。這固然合乎談話會「針砭時局」的宗旨，更重要的是這些口吻為的是更有效地同民眾溝通，或本身就似乎是「民意」的體現。如王鈍根一再批評臨時政府在外蒙問題上的失策，而在「自由談話會」中用粗黑體刊出他的「快與俄國開戰」的呼號，就伴隨着這一專欄作為「民意」喉舌的特殊功能。他說：「現在吾國同胞聽得了《俄蒙協約》的消息，個個咬牙切齒，磨拳擦掌，想與俄國開戰。惟有北京國務院裏幾個人，主張讓步，不敢開戰。」又說：「其實照全國民心看起來，已有不得不開戰之勢了。」在反覆理論不得不開戰之後，最後疾聲呼籲^⑫：

同胞，同胞，快快預備着，有氣力的快快整頓精神，預備投軍殺敵。沒氣力的，快快節省用度，預備捐助軍餉。

李歐梵認為「自由談」的命名源自於梁啟超的《飲冰室自由書》。我覺得「自由談話會」的「討論」形式也和《清議報》的英文原譯*The China Discussion*有關。「自由談」的文風，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相比之下，「自由談話會」只是個人直陳己見，主要是議論，在文體表現方面似乎局限得多。



「自由談話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自由談話會」的不簡單之處，在於它作為一個公共論壇的「討論」過程，從開始形成到建立，從進行到結束，都以讀者和「自由談」溝通的方式進行，有較高的透明度。「自由談」的投稿人大都是處於社會基層的小知識份子，以上海周圍為多。

以這樣類似請戰的口吻說話，作者似乎成為「民心」的代言人。

另一種較為精緻的，是個人的願望表達，如蛟門故我說：「吾願眾參兩院議員，勿負人民之託，耽延時日，揮霍金錢。」「吾願全國鐵路速通，俾商業發達。」「吾願將全國的嫖客流民，通通逐出中國。」「吾願將各國的債款，一一還清。」^④十數條詩行般的「吾願」，頗屬於奧斯汀(J. L. Austin)所闡發的具表演性的「言說行為」(speech act)，看似事實的陳述，卻含有意願、參與、期盼的成分^⑤。當作者在言及國內外一大堆緊迫的問題時，這種願望表達的形式能激起讀者關注而誘發他們的認同，當然其中也蘊含着代表「民心」的願望。

我們不禁會問：「自由談話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它沒有民意調查的根據，當時的傳媒還沒有類似的測驗機制。從這一意義上說，

「自由談話會」的不簡單之處，在於它作為一個公共論壇的「討論」過程，從開始形成到建立，從進行到結束，都以讀者和「自由談」溝通的方式進行，有較高的透明度。自1913年3月起，在投稿同人的建議下，「自由談」登刊他們的小照，陸陸續續約一年，共刊出一百三十餘位。這大約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也是少有的。每張小照一律稱「投稿者」，附有簡歷。由他們的名與號倒可以把那些奇奇怪怪的筆名和真人對上號，此外包括年齡、籍貫、現居何處，極偶然的提及職業。舉兩例：

便便巧裝小影——錢一蟹，江蘇青浦人，年三十七，現寓上海白克路永年里四百七十二號^⑥。

投稿者施晚芳女士——施晚芳，字希玉，年十五歲，江蘇婁縣人。現住上海大東門內^⑦。

憑這些小照，除了像陳蝶仙、丁悚等少數幾位名流，在其他《禮拜六》或《遊戲雜誌》等處也能見到他們的名字，此外一般很難知道他們是做甚麼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投稿人絕大多數屬於小知識份子，處於社會基層，散布在城鄉各地，以上海周圍為多。

「自由談話會」不時刊出投稿者的自白，說明當初如何鼓起勇氣向「自由談」投稿，卻石沉大海，在失望之際，突然見到自己的名字和稿件赫然登出，於是喜出望外躋身於作者之林。有一回刊出一段對話，丁悚諷嘲王鈍根，說他編輯「自由談」，「對於投稿，一概收入，無論好歹，來者不拒，儼然一輛垃圾馬車。」^④這些稿件無疑經過編者之手，不過至少編者試圖表明園地公開，投稿自由，機會均等，而「自由談」的作者群也確實顯示了代表讀者的廣泛基礎，具有相當的平民性和草根性。所謂「來者不拒」或許不無誇張，其實「自由談話會」也有關於投稿「規則」的討論，表明編者對來稿的取捨標準，自然意味着排斥那些不合「規則」的言論。

三 一個資產階級的公共「批評空間」

關於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的「文學世界的公共領域」(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及其與「夫妻家庭的私人領域」(the intimate sphere of the conjugal family) 之關係的理論，較少在中國場景裏加以討論。哈氏認為，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如咖啡館、沙龍、劇場、美術展覽廳及報紙、雜誌等成為

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其間聚集着來自「私人領域」(指家庭和市場)的個人，所討論、交換的不光是有關時下的政見，形成某種與權威當局相左的「公意」，也包括文學藝術，其最重要的傳媒是新興的小說。在哈氏看來，理查森 (Samuel Richardson) 的小說《帕美拉》(Pamela) 作為暢銷書，正適應了當時英國處於鼎盛期的「公共領域」的心理需要，開拓了「文學的私人領域」。在這部第一人稱書信體小說中，作者的內心獨白訴諸讀者公眾，與之溝通的那種啟蒙時代的普世人文價值，與「公共領域」中自由運用理性的精神息息相通。這一與社會相對獨立的私人領域成為培育資產階級主體的溫牀，從「自願、愛的社群及修養」三方面體現其自我觀照及相互分享的特徵^⑤。哈氏進一步伸論，與女主人公帕美拉的書寫的空間條件相關，隨着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佔主導地位，家庭和建築結構發生變化，當一夫一妻家庭成為基本單元，居住空間亦公私分明：客廳和起居間各司其職。在有身份的資產者家中，最富麗堂皇的是沙龍，它不屬於私室，而留作「社會」的交際場所。哈貝馬斯說^⑥：

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界線延伸到家庭。私人化的個人走出各自的內室，而來到公共領域的沙龍，然而這兩種空間是完全互補的。

《申報》上的「自由談」和「自由談話會」與這一情形異曲同工。前者如起臥間，後者如沙龍，在同一屋頂之下，投稿者在那裏自由進出。他們在「自由談話會」討論政局時事和都市文化，直接發揮批評的功能，而「自由談」中的「遊戲文章」在內容上與「自由

哈貝馬斯指出，隨着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佔主導地位，當一夫一妻家庭成為基本單元，居住空間亦公私分明：有身份的資產者家中，最富麗堂皇的是沙龍，它是留作「社會」的交際場所。《申報》上的「自由談」和「自由談話會」與這一情形異曲同工。前者如起臥間，後者如沙龍，在同一屋頂之下，投稿者在那裏自由進出。

談話會」互通聲氣，但更注重文體和趣味，以陶養性情的方式分享同人之間價值的認同，培植批評的主體。那種遊戲趣味，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論及十八世紀早期英國《旁觀者》(*Spectator*)等雜誌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時說，對於貴族階級嬉笑怒罵的諷刺和道德批評在本質上是理性而保守的，「主要是一種階級強化的機能，將典律符碼化和對批評實踐的調節」，英國資產階級藉此伸展自己的權益^⑩。

如果將哈氏的含有「理想模式」的「公共領域」作為參照，「自由談話會」作為一種開創性的「批評空間」，顯出中國情境的特殊之處^⑪。事實上「自由談話會」所代表的不止是一個商報的利益，而確實以滬上資產階級一度增長的實力作後盾，其抨擊黨派政治的「中立」立場，鼓吹以法律和議會為支柱的共和立憲，都反映了這一階級政治上的要求。

「振興實業，提倡國貨」是「自由談話會」的日常話題，但突出表現了它的主動干預及其強烈程度。像前面提到的王鈍根的「快與俄國開戰」那種義和團式的情緒表達，其實傳達了民族資產階級發展本土工商的要求，蘊含着對民主權的質問。的確其中所包含其同人的共識是經濟利益壓倒一切，如熱廬〈愛國談〉云^⑫：

民國一線生機，實維大多數商家是賴，商家一遇恐慌，金融阻塞，百貨停頓，影響所及，不止商家一方面，幾惹起全國動搖之勢。

在他們的國族想像裏，民國應當兌現其共和立憲的許諾，為發展民族經濟鋪平道路。這種想像事實上極其脆

弱，卻維繫着他們「中立」的批評立場。某則「自由談話會」把孫袁之間的戰事看作「兩機關之爭鬥」，老百姓既未贊成，亦無能力可以幫忙，只能採取「中立」，把自己所遭受的損失記錄在案，將來通過議會找他們索賠。然而袁世凱隨即解散國會，這種「索賠」的想法就顯得過於樂觀和幼稚。

「自由談話會」常對滬上的商業動向作具體的批評，其作者也不諱言，如海帆說^⑬：

「自由談話會」之談話，多提倡實業之語，資本家以及商業中，不可草草讀過。如能細心研究而改良，未始非振興實業，擴充商務之指南針，望閱「自由談」者注意。

這種干預有時頗為露骨，如逯儕明指「河南路某大綢緞店，以十萬資本金，設一洋貨店於大馬路，專辦舶來呢絨羽紗綢疋等物。噫，其愚可憫，其計亦左矣」。並譏刺「捨本逐末，吾國之資本家之知識，何其淺耶」^⑭。

這種干預意向同當時以上海商團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增長有密切關係。商團成立於1911年3月，是由幾個原先屬於市民教育性質的體操會等聯合而成的武裝團體。其領袖李平書，擔任滬上自治公所總董等要職。在隨即發生的辛亥革命期間，商團協助同盟會的陳其美攻奪清軍兵器庫江南製造局，遂使上海宣布「光復」，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臨時政府期間，陳任滬軍都督，李任民政總長，可說是商團與革命派的蜜月時期，而商團也迅速擴展，由二十個單位組成。當袁氏就任臨時大總統、革命派一再失利後而號召「二次革命」時，商團改變態度，公開要求袁氏當局採取

「自由談話會」常批評滬上的商業動向，這同當時以上海商團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增長有關。江浙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斡旋於孫、袁兩黨之間，企圖利用政治勢力達到他們發展自身經濟力量的目的，但他們的努力——隨同其立憲政體的幻想——迅速地破滅，「自由談話會」也成為曇花一現的景觀。

果斷措施，建立秩序。是時陳其美決定響應二次革命而策劃攻打江南製造局，尋求李平書幫助，卻遭到拒絕^⑤。

李平書背後支撐的是江浙立憲派首腦張謇——以清廷狀元、實業界領袖而在江南負一時之望。在辛亥革命期間，張倚向共和，據說李平書和陳其美合作光復上海，和張的幕後操縱不無關係。張又積極為袁世凱出謀獻策，促使袁的倒清而登上民國總統的寶座^⑥。1912年，在張謇等人的支持下，史量才從席子佩手中買下《申報》。史氏本來就和張等過往甚密，辛亥革命期間常在滬上聚集討論國事^⑦。

這其間江浙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如張謇、李平書等依違、斡旋於孫、袁兩黨之間，企圖利用政治勢力達到他們發展自身經濟力量的目的，但他們的努力——隨同其立憲政體的幻想——迅速地破滅，「自由談話會」也成為曇花一現的景觀。這與其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不如說它的幻想被民族「革命」的大潮所吞噬，其命運亦不得不隨之同沉共浮。這一中國情境中「公共領域」的特殊性，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卻找不到答案，似乎可以結合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一書中所論述的現代印刷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來加以討論^⑧。

四 小結：「自由談話會」 一波三折

一般認為史量才接辦《申報》之後，加強了該報的「中立」色彩，「自由談話會」自然亦步亦趨。1914年，上海商團由於袁世凱一紙通令而解散，「談話會」專欄也畫上了句號。其

曇花一現，看似寄生於資產階級力量的消長，但與英法「公共領域」不同的是，它所代表的「民意」沒有議會、法律等「公民社會」的保證，並非產生於資產階級政治機制的運作過程，其自主性也受到作者們의思想和道德立場的局限，最終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而早夭。換言之，「自由談話會」的形成和運作有其自身的思想條件和特徵。這批投稿者由普通市民和小知識份子組成，他們成為資產階級的喉舌，和英法「公共領域」的相似性，更確切地說乃是自晚清以來的以西方民主政體為模式的「想像共同體」的敘事的延伸。

在袁氏夢想恢復帝制而肆逞淫威之時，「自由談話會」或明或暗地表達了辛亥革命的民主和自由的價值，它的獨特的「討論」方式為公民自由運用理性提供了歷史的經驗，其「中立」立場不僅標舉「議論正當」和「新聞確鑿」作為報紙傳媒的倫理準則，並堅持「民意」與政黨或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那些投稿人具有的民間草根性，跟《申報》的權益者及資產階級上層並非完全一致，根本上還是代表了廣大市民的利益，典型的如王鈍根在一則談話中希望紡織業「大資本家」「能忍耐數年之折本」，降低織品的價格以滿足「中等以下社會」的消費^⑨。

這些投稿人的觀念形態從自由、立憲到商戰等，和《清議報》、《新民叢報》上梁啟超的普世性論述具有密切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畢竟也是梁氏所提出的以本土「民族主義」來對抗國際「民族帝國主義」的大波中的浪花。然而不無奇特的是，「自由談」的文風卻一反其「新文體」，與民初的小說——以徐枕亞《玉梨魂》為代表——交相輝映一種新式的古文，其間文脈交匯的契機仍值得參詳。如果

「自由談話會」的投稿者由普通市民和小知識份子組成，他們的觀念形態從自由、立憲到商戰等，和《清議報》、《新民叢報》上梁啟超的普世性論述具有密切的「互文性」，畢竟也是梁氏所提出的以本土「民族主義」來對抗國際「民族帝國主義」的大波中的浪花。

說受五四運動催生的白話文為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開啟了大門，那末「自由談」的文體似乎意味着關閉了這扇門，而「遊戲文章」的確保留了某種傳統士風的「私人性」，這一點也是後來五四諸公所疾視如讎的。

1913年9月，在同人們的努力下，《自由雜誌》出版，力圖擴展「自由談話會」的批評空間，但僅刊出兩期便被迫停刊^⑧。1914年7月起由王鈍根發起成立「儉德會」——一個舊道德色彩濃厚的鬆散協會——作為投稿者的歸宿，似乎也是一層保護自己的煙幕。不久他離開《申報》，轉向創辦《遊戲雜誌》和《禮拜六》去了。但「談話會」這一自由討論的形式20年代初在包天笑、周瘦鵑等人的雜誌上分別有所繼續，亦是「批評空間」的餘波蕩漾，關乎民初印刷傳媒「公共領域」的興衰，這有待另文討論了。

註釋

① See Henry Louis Gates, Jr., *Loose Canons: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xii.

② 近年來在北美學界不乏對西方中心主義或「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如《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雜誌在1999年刊出「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專號，集中討論了西方現代性之外各國(主要是第三世界)「本土現代性」的問題。其中談中國問題的收入李歐梵：〈上海摩登：回顧中國30年代的都市文化〉一文。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探討「五四」之外現代性的有王德威對晚清小說的研究(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8-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另有Denise Gimpel對民國初期

《小說月報》的研究(*Lost Voices of Modernity: 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Con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一些國際性學術會議也作了另類現代性的專題討論，就筆者所參與的包括2001年4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反思鴛鴦蝴蝶派小說」研討會和2002年2月在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反思五四運動」研討會等。

③ 所謂「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文中提到的是「三十年」或「六十年」前的事，那時《申報》還沒有「自由談」，但既指《申報》文藝，則非其文學副刊莫屬。見〈上海文藝之一瞥〉，載《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276。

④ 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頁243。另參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162-71。

⑤ 近年學界對於「鴛鴦蝴蝶派」的研究，最富收穫的當推范伯群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⑥ 近時馮並在《中國文藝副刊史》中，對「五四」前的《申報·自由談》作了專節介紹，論述了王鈍根、陳蝶仙等人的不同編輯風格，並指出「他們是一批具有現代修養與意識的副刊編輯者」。他認為「自由談」「基調平和，絕不觸動時局，更談不到針砭時弊」，與本文的意見不同。見《中國文藝副刊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頁154-59。

⑦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載汪暉、余國良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51-70。

⑧ 〈選舉運動法〉，《申報》，1909年3月13日，2張4版。

⑨ 〈敬告閱《潘傑小史》者〉，《申報》，1909年5月25日，2張4版。

⑩ 參樂梅健：〈《禮拜六》派大本營的重要營造者——王鈍根評傳〉，載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之五)(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頁212。

① 從1914年9月起，「自由談話會」的欄目名改成「談話會」，之後又出現「自由談之自由談」，不久也完全消失。這裏指最初出現「自由談之自由談」作為「自由談話會」欄目的告終。

②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3月16日，第10版。關於「自由談話會」的宗旨，其作者同人發表過許多文章，這裏出自張剛作為讀者的評語。

③ 朱英主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320-51。另見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417-22。

④ 《申報》，1911年12月26日，第8版；1912年1月30日，第8版。

⑤ 子序：〈新四書〉，《申報》，1912年2月29日，第8版。

⑥ 瑣尾：〈擬梅特涅致袁世凱書〉，《申報》，1912年1月30日，第8版。

⑦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5月14日，第10版。

⑧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7月4日，第13版。

⑨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8月5日，第10版。

⑩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2年10月27日，第10版。

⑪ 鈍根：〈外國便桶〉，《申報·自由談》，1913年1月3日，第10版。

⑫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9月7日，第10版。

⑬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11月19日，第13版。

⑭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9月19日，第13版。

⑮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9月23日，第13版。

⑯ 鈍根：〈東鄰悍婦傳〉，《申報》，1913年10月6日，第13版。

⑰ 鈍根：〈皇帝之魔鬼〉，《申報》，1913年9月1日，第10版。

⑱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4年1月18日，第13版。

⑲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11月27日，第13版。

⑳ 關於民國初期國會之情況，參張玉法：〈民國初年的國會（1912-19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6月），頁83-196。

㉑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2月23日，第10版。

㉒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4月14日，第10版。

㉓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6月13日，第3版。

㉔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5月25日，第13版。

㉕ 蝶：〈神權談話會〉，《申報·自由談》，1912年8月10日，第9版。

㉖ 滌骨：〈自由談中之自由談〉，《申報·自由談》，1912年3月1日，第8版。

㉗ 嘉定二我：〈自由談〉，《申報·自由談》，1912年9月28日，第9版。

㉘ 覺迷：〈談自由談〉，《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2月25日，第10版。

㉙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4月9日，第10版。

㉚ 《申報·自由談》，1913年12月8日，第14版；1913年8月27日，第10版。

㉛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7月22日，第10版。

㉜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2年11月19日，第10版。

㉝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5月7日，第13版。

㉞ 參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5-52, 94-108。另參陳嘉映：《語言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223-42。

㉟ 《申報·自由談》，1913年3月26日，第13版。

㊱ 《申報·自由談》，1913年5月28日，第13版。

㊲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6月12日，第13版。

㊳㊴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1), 43-51; 45.

㊵ 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0.

⑤① 將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看作一種「理想模式」的「現代性的理論陳述」，參註⑦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頁151。關於中國是否存在「公共空間」的問題，曾有過熱烈的爭論。如果辯證地對待歷史和理論之間的關係，首先涉及如何理解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作為一個「歷史範疇」(the historical category)。哈氏認為，「公共領域」出現在十七、十八世紀英法資產階級在同貴族階級鬥爭的歷史過程中，而咖啡館、劇場、沙龍、報刊雜誌等成為公眾自由討論和運用理性的場所；它建立在家庭和市場經濟的「私人領域」的基礎上，但資產階級成功地發展了公共領域，不僅使公私之間的界限分明並使之制度化，而且自由運用的「理性」以普世「人性」的啟蒙意識為前提。然而，近時一些學者批評哈貝馬斯的灼見中包含着遮蔽，他把「公共領域」看作單一的伴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而形成的歷史模式，而忽視了無產階級或女性的「公共領域」。在中國研究中主張存在「公共領域」的正犯了將哈氏理論單一化的缺失，盡力將中國境遇納入哈氏的範疇，過分誇大了公眾運用理性的自主性和機制性，從而模糊了公私之間的界限。另一方面認為「公共領域」不存在的，則屬於某種不同文化之間不可通約性的悲觀主義者。最近的研究表明，無論因噎廢食或削足適履都不可取。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一面堅持區分「官」、「公」、「私」之間的疆域，一面將「公共領域」追索到晚明至晚清時期的思想和實踐潮流(Frederic Wakeman, Jr., "Boundarie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Daedalus* 127, no. 3 [Summer 1998]: 167-89)。汪暉、李歐梵等提出「公共空間」的概念強調中國境遇的特有表現形式，自覺地處理了理論和歷史之間的陷阱和彈性，為探討「另類」公共領域開闢新途(Wang Hui, Leo Ou-fan Lee, with Michael M. J. Fischer, "Is the Public Sphere Unspeakable in Chinese? Can Public Spaces [gonggong kongjian] Lead to Public Spheres?", *Public Culture* 6, no. 3 [1994]: 597-605)。

⑤② 熱廬：〈愛國談〉，《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6月1日，第13版。

⑤③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6月19日，第10版。

⑤④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1月14日，第10版。

⑤⑤ 參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商團同志會：〈上海商團小史〉，載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86-90；傅墨正等：〈辛亥上海光復前後〉，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1-19；楊立強：〈上海商團與辛亥革命〉，載《清末民初資產階級與社會變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106-37。

⑤⑥ 參章開沅：〈辛亥革命後的黃興和江浙立憲派〉，載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史論文選》，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1175-81。

⑤⑦ 參嚴獨鶴：〈辛亥革命時期上海新聞界動態〉，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集，頁78-85；宋軍：〈申報的興衰〉，頁84-94。對《申報》在辛亥革命期間的中立傾向及與史良才的關係，參朱英主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頁320-77。

⑤⑧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最近藤井省三先生結合安德森「想像共同體」理論來觀察現代中國文學的問題，見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⑤⑨ 《申報·自由談話會》，1913年3月11日，第10版。

⑥⑩ 湯志鈞主編：《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頁768。

陳建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助理教授，專著有《「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中國江浙地區十四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